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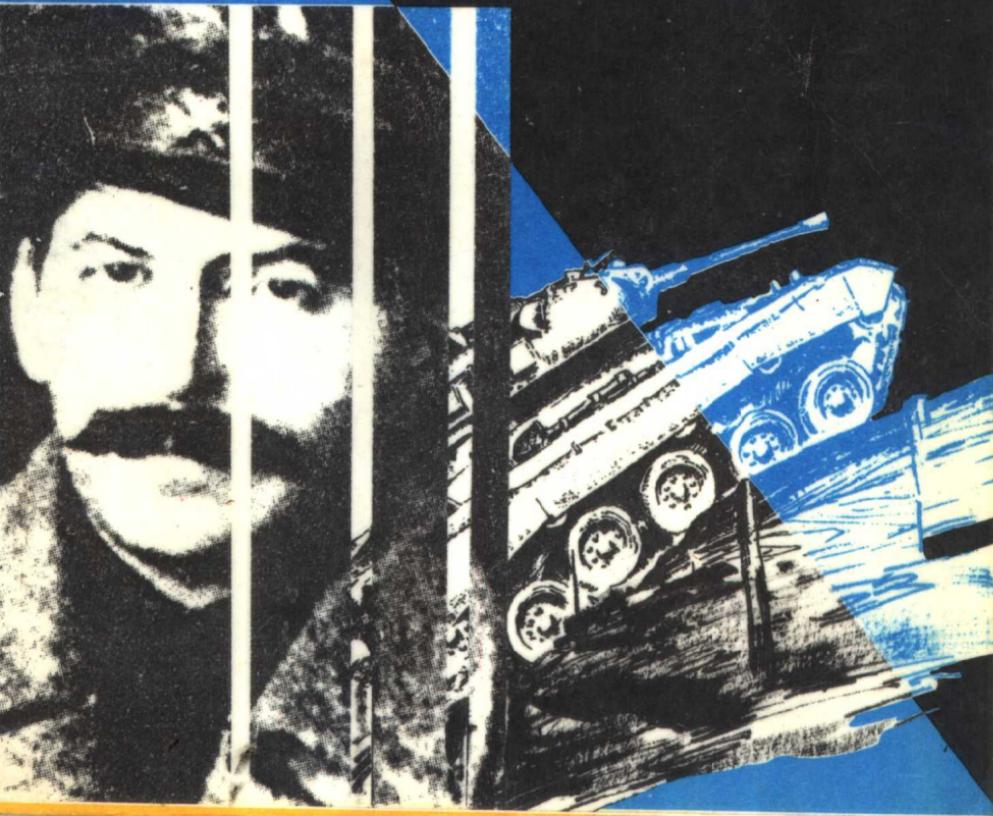
世界二

珍闻丛书

1

战
斯大林坦克
挥师远东

●王家福/著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一）

斯大林坦克挥师远东

王家福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世界二战珍闻丛书(一)

斯大林坦克挥师远东

王家福 著

责任编辑、责任校对：李有清

封面设计：张沐沉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

吉林大学出版社发行

(长春市东中华路 29 号)

吉林农业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1995 年 8 月第 1 版

印张：5.75

1995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字数：126 千字

印数：1—3000 册

ISBN 7-5601-1791-0/Z·77

定价：6.00 元

目 录

欧战奏鸣乐的东进序曲	(1)
雅尔塔“超级市场”	(31)
东进利刃的历史盾牌.....	(62)
地缘政治强化中转兵站.....	(91)
T—34 横扫远东边陲	(119)
坦克牵引工作母机凯旋	(154)

欧战奏鸣乐的东进序曲

二战烟火在欧亚炽烈地点燃之时，国际公众顿时感悟到，法西斯企图在地球东西两个战略基地为发端夹击世界，进而以铁血政策改写人类文明史。然而，大地常在，人民之树常青。中经几年的浴血反击，全世界人民拉紧每一条神经，紧张每一块肌肉，以鲜血为水泥，以身躯为钢筋，筑成了反法西斯战争的钢铁长城。时至 1943 年，气势汹汹的德军在苏维埃大地上败局初定，不可一世的日军在广阔的亚太地区已近死神缠身。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在钢铁撞击声中行将迎来胜利的曙光。此时此刻，欧战奏鸣乐拨响了苏联^① 东进的序曲。

众所周知，苏联是横跨欧亚之国。往昔，当日本法西斯所谓“北进”政策占上风之时，日本图谋以陆军为主力，从苏联国土的东部进击苏联，并同德国法西斯从苏联国土西部入侵遥相呼应，借以形成对其夹击之势。一旦得逞，便在战略上形成以地球北部为依托，由北向南席卷全球。尽管由于种种复杂的原因，日、德上述战略意向未及成真，但斯大林对苏维埃俄国初期资本主义两线夹击十月革命故乡还是记忆犹新的。还由于各种复杂因素所及，苏联东进序曲是由多种

^① 苏联是指原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全书同。

音符合成的。

说起苏联红军战略东进，斯大林的意图是把“博大”与“细微”交织在一起；这个意图起则是秘而不宣；继之而世，但“无所求取”，最后推及到多多益善的“索取”。对欧战结束以后，苏军在远东对日军作战一事，早在德黑兰会议期间，斯大林便对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有所承诺，但把它付诸实施还要顾及外交上的契机。这是因为早在1941年就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有效期为5年，此时恰是这个条约的有效期。

世界法西斯主义似乎也是同命相连，特别是在他们遭到灭顶之灾的前夕，至低如此。还因为更深层次的原因，日本审视德军在苏联的败局，便利用苏日中立条约为引线，试图“调解”苏德关系，试图遏制他亡引发己亡的势头。此时，德军在库尔什克战役惨败，苏军继之转入反攻，到1943年9月，苏军收复了哈尔科夫，并向第聂伯河挺进。与此并行的是，墨索里尼垮台了，盟军在意大利登陆，德军被迫在这里图谋反抗。这种形势助推日本再次调停苏德关系，在日本看来，在战略上保住了“德国的西方”，才能在战略上稳住“日本的东方”，进而在全局上寻求转机。在希特勒看来，一旦日本调停成功，苏联就从世界反法西斯联盟中分离出来，并可以使德军从苏联战场脱身而出，集中力量对付西方盟国即将发动的进攻。从这个方面出发，希特勒此时显然已不再反对日本出面调停；但他也感到当苏军处在挺进势头甚旺之时，那种调停是不合时宜的。因此，希特勒拒绝了日本的建议。事实上，斯大林显然不会受理日本的所谓调停，所以，他通过外长莫洛托夫和苏联驻美国代办葛罗米柯不间断地向世界发出拒绝日本调停的建议。但明眼人更会注意到，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声明中还有另外一句话，即在另外一种情况下，苏联

政府可能会认为它有责任接受日本调停的建议。

人们不禁要问，那本来是无望之举，为什么在彼时竟然成为战争时期外交秘闻中的一个“热点”呢？这个事说来是个谜团，但其中却有战中之战的味道。在日本看来，反复站出来调停德苏关系，就是向世人重提仍有个苏日中立条约，日本的这一重提，也是外交行为中的一种现实确认的举动，借以昭示世界，并稳住苏联，谨防在战场上出现对日军的美苏南北夹击之势。在德国看来，这也是通过外交途径推进心理战。所谓日本调停时隐时现，外交行为夹杂在公开与保密中，至低在视线与心理上诱发西方盟国对苏联出现疑虑的目光。同时，希特勒幻想以此为强心剂，在政治魔窟中出现点滴转机的灵光，以其虚幻的光点强化自身的心理感应。在斯大林看来，反复受理并拒绝日本调停也是表明，苏联注意到了双边中立条约的存在，借以稳住日本，防止苏联在欧洲胜利进军之际，日本在东方回窜之患。更重要的还在于，斯大林利用这一外交迷网达到苏联政府的主要目的，其中一点是，以日本调停为引桥，在全局上取得外交上的战略主动权，要求美国给予必要的协同。

正是各方各有所求，势必出现假戏真唱，况且还夹杂着外交上的真真假假。所有这一切，时而在公开场合张扬，时而在秘密中勾划。日本政府基于苏联不会无视于战后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称霸为前提，希望苏联出来调解为自己取得“妥协的和平”，并准备付出极其重大的代价。日本内阁在秘密策划中，甚至为此可考虑修改外蒙古和伪满洲国之间的边界，并在这里建立非军事区。如果苏联同意由日本调停苏德关系，作为交换条件，必要的话，日本准备把中东路“归还苏联”。这条铁路是1935年由伪满洲国以非常低的价格买下来的，这种

价格反映了当时日本得以对苏联施加的压力。如有必要，日本政府还可以割让萨哈林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如果苏联出面调停与国民党政府达成和平，日本政府也准备付出同样的代价，只是不割让千岛群岛。

然而，这不是斯大林的意愿。与此相反，苏联政府正在准备对日本进行干预。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会议期间，美国驻苏联军事使团团长迪恩少将问斯大林，苏联将在何时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在第二天便作了明确地答复。他说，苏联在远东部署了30个师，当有60个师时，苏联就将对日开战。斯大林的答复同与会的丘吉尔预料的截然相反，令后者极为惊愕。当然，这个声音正是美英政府所企盼耳闻的。美英企盼苏军对日作战，当然是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斯大林已经洞察了美英的这一意图，并乘势谋求苏联的利益。在斯大林的帐本上，日本预想投给苏联之利当收不让，只是不用“调停”之便，而是用战争的推进器获取。斯大林之举，在战争的胜利者看来是顺其自然的。何况，两者并不是“手段”之别，那种“史诗般”的自然获取法更可以在战后世界发挥重大的战略扩张效应。否则，苏联如借所谓“调停”获利，势必在战后世界泛起战前《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那股“与魔鬼结盟”的喧嚣，且经久不息。那在战略史册上，苏联将会成为军事上的胜利者，政治上的失败者，并将会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无论怎么说，斯大林决不会走所谓调停之路。

斯大林决计与日本法西斯开战，并势在必得，这也是美国政府的渴望。有鉴于此，斯大林乘机开列了美国为此举必须付出的物资清单。莫斯科会议期间，斯大林头一天还声称这个物资清单不能写在纸面上，据称是为了“保密”。然而在第二天，即10月17日，斯大林却向美方交出了这个清单：一

支由 150 万兵员、3000 辆坦克、5000 架飞机和 7.5 万台机动车辆组成兵力所需要的两个月的粮食、燃料与运输装备以及其它物资。总数为 86 万吨干货和 20 万吨燃油，全部要在 1945 年 6 月 30 日前交货。由于双方的情况与延误，美国还是在规定的期限内向苏联提交了其中 80% 的货物。在西方看来，斯大林受到了他的同盟者的慷慨相待。美国在战争中也并非是苏联的万能仓库，此时对苏联如此“慷慨”相助，也是基于苏联对日作战之愿没明确提出领土等要求。这类要求不仅涉及到以后战败的日本，还将旁及他国，甚至会涉及到中国的权益，这对美国说来也多有难念的经。对此类要求，斯大林早有意向，此时不便充分暴露；一旦时机成熟，还会把另一类清单摊在美方眼前。

1944 年 11 月 7 日，斯大林在十月革命节例行的纪念讲话中，首次公开地称日本为侵略国，令日本政府十分惊慌。按照惯例，双边中立条约的一方认为另一方为侵略国，自然是双边关系的根本转向。但是，莫洛托夫在回答日本大使询问时则轻松地说，斯大林的意思仅仅是指日本过去的行为，并没有指责日本现政府的政策。对在战场上处在垂危的日本来说，不得不以得到的回答为“满足”。而对反法西斯侵略的盟国说来，苏联政府则是向全世界发出了明确无误的信号。

斯大林是言出必行之人。他说干就干，抓紧干；干就干好，干彻底。早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德国法西斯的闪电战猝不及防地砸破了苏联的国门。德方拥有 3400 辆坦克的 300 万大军，继大批飞机编队先行狂轰之后，随即转入摩托与坦克宛如火龙般的地面进攻。多年自诩为“无坚不摧”的苏联边防前沿部队，倾刻间乱作一团，溃不成军。此时的斯大林惊魂未定，在莫斯科米亚斯尼科夫大街地下铁道车站的指挥

所里，呆坐在沙发上，显得疲倦不堪。这是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最暗淡的时刻。但是，终究是时过境迁。此时，斯大林已是铁铸钢雕式的统帅，他在坚定而自如地总揽苏联军事、政治、经济和社会全局。在世界反法西斯战场上，斯大林在细致入微地审视战争全局的走向，精雕细刻地磨制苏军这把利刃，并把它挥向他要挥向的远方。简明而切中要害地说，斯大林手握的一支利刃，就是苏制T-34型坦克，它在整个二战战场上是王牌式的主战坦克而雄居世界之首。在本书里，“斯大林坦克”的寓意之一，就是意指突破一战的“光荣的历史经验”而展现的二战先进军事理论的象征。当然，与先进坦克并行还有飞机与摩托车、装甲车等。但是，犹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初期遭受重创那样，“斯大林坦克”在国内阶级斗争风火中铸就也是以鲜血和生命为巨大代价的，它也在引发人们常思常新的反思。从这一角度理解问题，“斯大林坦克”是欧战奏鸣乐的主旋律，也是苏军战略东进序曲的主要乐章。

当今人们习以为常的坦克与战斗机，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却是军事家的众讼纷纭之物质。两次大战之间，整个世界的军事思想和军事理论都在发生着重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各主要交战国对战争的认识仍停留在19世纪的水准上。当时，双方的军事战略和作战计划都建筑在短期战争的准备上。一战变成了持久的消耗战。第一次世界大战宣告了短期决战思想和军事战略的破产。随后，世界主要国家的军事理论和军事思想开始发生变化，涌现出一些新的军事思想，并与传统军事思想发生冲突。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新旧军事思想争论主要表现在如何看待当时新式兵器飞机和坦克的问题上。一战期间，飞机和坦克是作为少许的辅助性兵器出现在战场上，人们似乎没发

现新兵器的威力。当然，在战场上那是步兵的时代，其中有骑兵的机动性已是锦上添花了。一次战后，某些思想比较敏锐的军事家开始注目于飞机与坦克的运用。其中意大利杜黑的观点显得颇为突出。杜黑曾是位上将，长期注目于军事史和军事理论研究。他认为，由于飞机的出现，堑壕战在未来战争中是不可能的事。因此，陆军与海军必须让位给空军。杜黑形象地比喻说，远程轰炸机能够摧毁敌方的军事和经济结构，这如同摧毁了鸟巢，就能打破它的蛋一样。按着杜黑的理论，陆军和海军就被限制在单一防御作用的范围。法国军事权威贝当元帅虽然接受了杜黑的理论，在实际上是固守防御战略。历史往往就是这样，在新旧思想冲突的交界线上，敢于实行惊险地一跳的人总是少数，而大多数人是沿延今天象昨天那样生活，固守传统的城池。在一些国家里，军方的视野远没有超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谓“光荣的历史经验”，仍是热衷于战斗机下挖壕，在坦克面前筑垒，并在心扉里颇有固若金汤之感，公众似乎也在这类防线中求得了企盼的安全。

两次大战之间，新旧军事思想与军事理论争论的焦点，更多的体现在如何看待坦克问题上。英国军事理论家富勒等人在 20 年代初期就提出了坦克战思想，英国军事历史与军事战略家利德尔·哈特的著作在欧洲也产生了重大影响。而在英国举行的军事演习也给欧洲军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是，纵然英国在欧洲首先提出了坦克战思想，在世界军事史上具有开创性，不过象 20 世纪英国在科技领域那样，尽管他更多的是世界新理论、新概念的源头，然而却不勇于或不善于走向开发和应用。这样，在实战上英国没有因势利导地解决坦克与其它兵种协同作战的难题。这个难题是历史性的。人们稍微一想就会发现，让士兵的双腿跟上坦克的速度显然是异想

天开；而硬让坦克放慢速度跟在步兵后边，无异是让士兵背上了一大堆沉重的“废铁”。英国军事理论界在这个大难题前裹足不前，实际上他是被一个难点卡住了：在未来战争中，是让坦克发挥主导作用，还是让坦克起辅助作用？在今天看来是个非常简单的事，而在新兵器的历史起点上却是实践的实际难点。当时的难题是，让坦克发挥主导作用，步兵如何才能跟上去；如让坦克起辅助作用，怎样发挥坦克的功能。在这一历史交界处，如能实行惊险地一跳，便可大功告成。

在这个历史性的接轨点上，德国的古德里安将军借高而起。在英国富勒和利德尔·哈特军事理论影响下，古德里安潜心地研究了这一新的军事理论，并精雕细刻地分析了英国军事演习的状况。借助于英国军事理论及其实践启迪，古德里安确信：只有支援坦克的其它兵种具有与坦克相同的行驶速度和越野力时，坦克才能真正发挥本身的威力；在诸兵种合成兵团内，坦克应起主导作用，其它兵种则根据坦克的需要行动。为了使坦克更好地发挥作用，不能把坦克编在步兵师内，而必须建立包括各兵种的装甲师。

古德里安上述的军事理论就是以后德军建立坦克集团军的基础。但是，在当时的德国军界对此只是付之轻蔑的一笑，有些人站出来说，那是异想天开；更有些人批评说，那是纸上谈兵。在他们看来，传统军事理论才是借以建立功勋的法宝。问题的症结在于，未来战争仍然是防御战，还是进攻性的闪击战？传统军事理论家认为是前者，他们确信未来战争的主要兵种是步兵。新军事理论家认为是后者，所以要增加快速进击的主战兵器。通俗地说，未来战争的主旋律是慢，还是快？慢者，用步兵；快者，自然用坦克和飞机等。从这个方面看，古德里安是在理论与实践结合上站在了军事战略的

前沿。况且，坦克在未来战争中的作用，已从康布雷战役和亚眠战役得到证实。正因为如此，在坦克战术发展方面，一般认为，英国大约落后于德国 10 年。英国首先提出了先进的理论，但在实际应用上却远远落后了，这也是 20 世纪英国的一个普遍现象。

法国自诩为欧洲大陆的陆军强国，号称拥有一流的陆军。在法国，主张坦克战的艾斯蒂安将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用战车和炮队实施攻击的创始人。在两次大战期间有关军事理论的论争中，国内只要少许人支持艾斯蒂安。其中有两个人颇具代表性。一个是颇有名位的保罗·雷诺，他是口头赞赏，并没有支持行为。一个是戴高乐，当时地位寒微，但却身体力行。他在人们争论与讥讽中推进坦克战理论，并在 1940 年任坦克旅长。在史学界有个世界三大坦克旅长之说，按照这家之说，其中就有法国的戴高乐。形象地说，戴高乐来到人世间就是引发人们争论的人物。何况，彼时的法国军界又是欧洲大陆保守之垒。军事家和政治家一直沉湎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光荣的历史经验”之中，他们更赞同“防御战略”。在他们看来，这是个一举两得的事情：防御战略，对于军界来说，鉴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它容易被接受；对于公众来说，有个往昔经验形成的安全感。为此，法国注重所谓“健全的防御”，“静待”敌人的进攻，使用“堡垒和壕堑构成无法突破的延伸战线前遏制住敌人。”这样，法国更注重步兵这一传统兵种，特别忽视发展坦克等先进兵器。世人共知的马奇诺防线和雷诺防线等，就是这一军事理论的一种体现。战前曾喧嚣一时，战争中成了害己之物，战后则成为旅游之地，其内部装修之豪华，令当代人为之惊愕——这类防线不间断地向世人折射反思之光。

顺应世界先进军事理论的前沿走势，苏联 20 年代的军事思想相当活跃。特别是在 1925—1929 年期间，苏联军事院校和军事报刊展开了一系列的生机勃勃的讨论。中经充分的大讨论，全国军事理论界把军事学术分为战略、战役法和战术等三个层次，从而形成了苏维埃军事理论的独特体系。作为这一体系的反映，出现了一批有较高水平的军事战略的著作，诸如伏龙芝的《未来战争中的前线》，图哈切夫斯基的《现代战略问题》和斯维钦的《战略论》等。特别是在伏龙芝的论著中还提出了“闪击战略”和“消耗战略”等新概念。

正当苏联战略理论研究大幅度向进推进之时，20 年代末期的“大转折”突然降临整个苏维埃大地。以全盘农业集体化运动为燃点，一处点火，两处冒烟：在党内推行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在全国城乡展开对资本主义的全面攻击，并在其浓烟烈火中推出了恐怖性的“大清洗”高潮。

20 年代末期，由于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急剧膨胀，令极“左”思潮乘势而起，它严重地冲击了苏联军队和军事理论界。不同的军事理论见解被说成是“实际上要把红军引向失败”，阐述这一理论的人被看成是“充当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代理人”。此举在实际上宣告了这次军事理论讨论的终结。顺着这股潮流，有人站出来说，战略问题是斯大林同志研究的问题。显然，他人根本不配研究战略学，据此，图哈切夫斯基当然被禁止从事战略学研究。战略学研究工作在苏联刹车了。

战略学研究被废止以后，苏联军事理论研究涌向了战役法研究，并取得长足进展，其中体现在纵深战役理论更为明显。纵深战役理论属于战役法，对这一理论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是图哈切夫斯基等人。他们主张在大量运用坦克和飞机的基础上，实施打击敌人分布的全纵深，以及对敌人纵深进

行打击时运用梯次配备的坦克集群问题。在纵深战役中起主要作用的是坦克、炮兵和航空兵；步兵作用主要是巩固坦克的战果。1936年颁布的野战条令中，正式确认纵深战役理论是苏军未来战争中应当采用的新的作战方法。从战役法考察，1936年条令标志着苏联纵深战役理论在当时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20年代的战略学和30年代中期前战役法的研究成果，成为推进苏军现代化建设的理论设计。当时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图哈切夫斯基和红军总参谋长叶戈罗夫等人，预见到坦克、飞机和无线电等新兵器和新装备在未来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为此，加强了新兵种的建设。空军占全军比重由1928年的2%，上升到1938年的12.8%；同期陆军比重从92.6%降为75.2%。陆军中的装甲兵、炮兵、工程兵和通讯兵等技术兵种的比重，则由1929年的21%上升到1938年的51%。1932年，苏联建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机械化军，把它作为向战役纵深扩大战果的快速兵团。1933年，苏联组建了战略航空兵——重轰炸航空兵军。苏联也是世界上第一个建立空降兵的国家，到1936年共组建了6个航空旅。

至此，苏联的前沿性的军事理论及其物化的先进兵器可称为世界一流，特别是同英、法等国相比完全处于领先地位，并引发了国际性的注目。其中希特勒的视线别具特殊的色彩。希特勒是在1933年1月上台的，德国历史揭开了最黑暗的篇章。30年代，德军的机械化成了建军的首要问题。但是，根据凡尔赛条约，德军不得装备现代化兵器，全军不准装备一辆坦克。当时，德军利用坦克的木制模型进行训练。1930年，德军的摩托化部队只装备几辆陈旧的装甲侦察车和几个摩托车连。到了1932年，参加军事演习的摩托化分队还在使用木

制模型坦克。德军从这些演习中明显地看出，坦克将在未来战争中发挥重大作用。希特勒上台后，基于发动侵略战争的现代兵器准备，特别注视坦克战理论。古德里安关于军队机械化方面的建议，尽管遭到某些高级将领的激烈反对，却得到了希特勒的特别支持。希特勒尽可能了解有关摩托化和坦克的技术问题，并确信现代先进兵器，特别是飞机和坦克的突击效能，他赞同古德里安的坦克战的战略战术。1934年7月，希特勒下令成立了装甲兵监，并任命古德里安为总监。从此，德军装甲部队得到迅速发展。每每试验新型坦克时，希特勒都赶到现场。为研制坦克，要钱给钱，要物给物，希特勒对军方的要求一律照办。1935年，希特勒正式宣布废除凡尔赛条约的军事条款，并在当年建立了三个机械化师。

欧洲有关坦克命运的理论与举措，正是世界二战的超前展映，并在决定着各国在战争初期的结局。时至1937年，法国还滞留在把坦克的作用局限于直接支援步兵的地位。1940年夏天，法国终于被迫吞食这一理论的苦果。尽管英国首先提出了坦克战理论，但是却长期倾向于“单纯坦克”的主张，直到1942年末，才开始注意装甲师内坦克和炮兵的密切协同。历史已经证明，英、法上述的坦克理论对德国来说，已经是姗姗来迟，并造成了战略恶果。德国把坦克战理论推向前进，远远走在英法之先，并于1937年开始组建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坦克军，进而计划组建坦克集团军。

综观欧洲坦克战理论与实践的态势，希特勒不难发现，他在欧洲开战的对手是斯大林，德国坦克战的克星是苏联的现代化快速兵团。为此，希特勒决心利用苏联国内大清洗的烽火，通过斯大林扫荡苏联的现代化军种。这是随后坦克战之前的阴谋战，进而使德国坦克在战场上成为一支独秀之花，它

更是希特勒发动侵略战争的一个前提条件。这一鲜为人知的“阴谋战”，就是图哈切夫斯基的所谓“叛国案”。

希特勒的“阴谋战”的发端就是制造图哈切夫斯基的“阴谋”。早在1935年，纳粹党党卫队仅次于希姆莱的二号人物海德里希就开始建立反苏组织，并同前白俄将军进行接触。约在1936年圣诞节前几天，海德里希同希特勒、希姆莱进行一次决定性的谈话。以后几经密谋，希特勒和希姆莱批准了海德里希的阴谋计划。

1936年4月9日，苏联工农红军情报总局局长向斯大林报告说，近期柏林盛传有关在苏军将帅中存在着反对国家领导人的派别活动的谣言。同时，这位局长还以《德意志汇报》文章为证，人们都不相信这种传闻。对此，斯大林似乎没有轻信，但从基洛夫被害为起点，大清洗已经开始，他当然要录以备考。随后，内务部头目叶若夫也送来一份材料，其中讲到苏联有一批高级指挥员正准备发动“政变”。据称，“阴谋”的首犯是图哈切夫斯基。这个材料来自巴黎，是那里白俄侨民组织报送来的。

图哈切夫斯基于1914年毕业于莫斯科亚历山大军事学校，获中尉军衔。时值一战爆发，他被投入战场。他在前线六次获奖，并在被俘后中经五次逃跑成功。他从德军集中营逃回祖国正处在伟大变革的前夕。十月革命胜利后，他投入了革命的怀抱，并于1918年加入了苏共，开始在全俄苏维埃中央委员会军事部工作，经常会见列宁。在国内战争的血与火交织的战场上，身经百战，战功卓著，为捍卫苏维埃政权建立了杰出的功勋。国内战争结束以后，历任要职，积极参加军事改革。1934年起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兼军训部长。1935年，图哈切夫斯基同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叶戈罗夫和布柳赫尔